

SALOME
REN XUESHI



世界人学史

第四卷

主 编 孙鼎国

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四编 现代人学

第三章 中国现代人学	(3)
第一节 蔡元培论人	(8)
第二节 陈独秀的人学思想	(13)
第三节 李大钊的人学思想	(20)
第四节 鲁迅的人学思想	(30)
第五节 科学与玄学论战 ——关于科学与人道的一场论战	(40)
第六节 胡适的人学思想	(47)
第七节 梁漱溟的人学思想	(56)
第八节 冯友兰的人学思想	(65)
第四章 日本现代人学	(75)
第一节 战后马克思主义人学	(76)
第二节 战后哲学流派中的人学	(80)
第三节 一些社会科学家的人学	(86)
第四节 著名文学家的人学	(92)
第五节 著名人士的人学	(101)
第五章 印度现代人学	(107)
第一节 泰戈尔的“人生亲证”	(107)
第二节 甘地论“非暴力”的人类目标	(117)

第三节	奥罗宾多的神圣人生论·····	(125)
第四节	普列姆昌德痛陈社会之丑陋·····	(133)
第五节	拉达克里希南论人的有限与无限·····	(137)
第六节	异域之风——印度伊斯兰教的“神我同一”·····	(146)
第六章	阿拉伯近现代人学·····	(154)
第一节	瓦哈卜运动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的人论·····	(155)
第二节	宗教改革家的人学思想·····	(156)
第三节	西方人学思想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	(159)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影响·····	(165)
第五节	民族哲学中的人论·····	(166)
第六节	社会哲学中的人论·····	(168)
第七节	近代阿拉伯文学家论人·····	(171)
第八节	巴哈伊教的人学思想·····	(179)

第五编 马克思主义人学

第一章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	(222)
第一节	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222)
第二节	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总体构架·····	(250)
第三节	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基石 ——关于人的本体论·····	(277)
第四节	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观的分析·····	(320)
第五节	马克思关于人的历史观·····	(347)
第六节	马克思关于人的价值观·····	(376)
第二章	列宁的人学思想·····	(437)
第一节	背景—历程—方法·····	(437)
第二节	列宁人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444)
第三节	列宁人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 史中的地位·····	(466)

第三章 毛泽东的人学思想	(471)
第一节 毛泽东人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	(471)
第二节 毛泽东人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479)
第三节 毛泽东人学思想的得与失.....	(494)
第四章 邓小平的人学思想	(504)
第一节 背景、问题与方法	(504)
第二节 线索与特征.....	(513)
第三节 邓小平人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519)
第四节 邓小平人学思想的历史贡献.....	(530)
结束语	(536)
后 记	(538)



世界人学史·第四卷

SHIJIE RENXUE SHI DI SI JUAN

第四编

现代人学

第三章 中国现代人学

中国现代人学是中国近代人学的延续和发展。作为人学，中国现代人学与近代人学一样，有着共同的时代课题，即中国向何处去，并围绕着如何回答时代课题、实现时代课题而展开了人学的讨论。之所以有“现代”和“近代”之分，不是基于简单的时间划分，而是因为现代人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征。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使一批知识分子和先进人物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由唯心主义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当他们完成这一转变之后，立即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来批判和清算封建主义思想包括它的人学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潮包括它的人学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并将它付诸实践，从而开启了中国思想史包括中国人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崭新阶段。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同时，西方各种思潮也对中国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资产阶级也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意识形态，与早期共产主义者共同组成了反封建的统一战线。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大资产阶级便逐渐从统一战线中分化出来，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工人运动，反对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退化过程，在人学思想上也得到了深刻的反映。中国现代资产阶级人学思想，并不是从孙中山那里发展而来的，而是更多地来自

西方资产阶级。

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取得了对各种非无产阶级人学思想批判的伟大胜利，从而为在中国建立完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条件。

中国现代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也是一个各种思想百家争鸣的时期。不同的思想潮流都在这时登上了历史舞台，彼此争论，互论短长，并且在相互斗争中不断发展、变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开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是中国现代人文的奠基者。在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其思想具有革命的民主主义色彩。当时，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对封建主义人学采取了猛烈的批判态度。

陈独秀指出，中国传统的“家庭本位主义”，损坏了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窒碍了个人思想的自由，必须彻底废除，以建设个人本位主义。他提出了自主的、进步的、科学的人生价值论，极力提倡以勤、俭、廉、洁、诚、信为原则的人生行为准则。

李大钊提出了劳动是快乐的源泉的“尊劳主义”，从而提高了劳动的意义，提高了劳动阶级的社会地位。他又针对袁世凯“大盗窃国”、欺骗民众的行为，提出“民彝”说，认为民彝是制定治国治民政策的根本依据，是辨别是非曲直、真伪美丑的根本标准。这是对先秦以来民本思想的充分发挥，在人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陈独秀、李大钊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历史过程后，其人学理论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李大钊抛弃了“民彝”学说中的不合理因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阐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他还勾画出共产主义人生观的轮廓，即以解除人民大众的苦难、谋求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己任，在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的同时，他认为还要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明知革命征途曲折险峻，也要义无反顾，勇敢地前进。他还表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对

待生死的态度，他本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用生命和鲜血实践了自己的人生观和生死观。

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家是鲁迅。鲁迅对入学理论的贡献在于，他以凝重的历史感和深沉的责任感，透彻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民性，阐述了造成这种国民性的历史根源。他还批判了资产阶级入学理论，特别是批判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从理论上揭露了封建主义入学和资产阶级入学的反动实质。

总之，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逐步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批判封建主义入学和资产阶级入学，研究无产阶级入学理论。他们的尝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如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对其理解尚不够准确、系统、全面，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理论水平还不太高等原因，使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入学理论还处于探索的阶段，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旗手，他以实验主义作为理论武器，对封建入学进行了深刻地批判。他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天理人欲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清算，指出理学“以理杀人”酷于“以法杀人”。人欲，是个人生来具有的自然本能，是社会道德的基础。他积极倡导个人主义，主张把自己铸造成器，方可希望有益于社会。他从创造的实在论，推导出以个人创造和奋斗为基础的创造性的人生观。胡适的这些思想观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批判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已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的抵制作用。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尽管号称是围绕着人生观问题进行的，但是由于论战双方理论上的缺陷，致使这次论战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梁漱溟是东方文化派的代表，并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梁漱溟糅合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与中国传统唯心主义哲学为一体，创

造性地提出把人的“意欲”作为世界的本源。他根据人的“意欲”的努力方向,将人生的路向分成三条,进而将人类文化分成三路向。梁漱溟指出,中国儒家文化终将在未来复兴于世界。这实际上是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梁漱溟的理论一方面是对当时“全盘西化派”的反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者的保守性。

冯友兰明确宣称自己承继宋明理学的余绪,建立了“新理学”。他把“理”分为“天之理”、“社会之理”和“人之理”,其中的“人之理”,实际上就是人学。冯友兰的境界论,是其人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冯友兰全面检讨了关于传统哲学中的人学问题,提出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者在觉解,觉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他进而根据人的觉解程度的差别,把人生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并论证了四种境界各自的特征。在他看来,这四种境界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境界的高低,标志着人格完善的程度。冯友兰基本上构建起一个“人之理”的人学思想体系。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人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在随后的发展中,中国现代人学虽然也还存在理论水平不高、不系统等缺点,但它也表明了现代人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简要说来,其特点表现如下:

第一,与中国现实相联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中国现代社会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现代人学也与中国现代政治密切相关。

中国向何处去?如何救亡图存?这是中国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核心,现代思想家不管其阶级属性如何,党派性如何,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其思想核心都是批判封建人学、建立新人学思想体系。抗战时期,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冯友兰建立新理学,都有为现实服务的一面。许多现代人学的思想家首先是政治家或社会活动者,他们在政治活动中提出和完善了各自的人学思想。

另外,不同思想家的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

不同的变化。有的人年轻时是进步的、革命的，但后来却趋向于保守甚至反动，其思想必然也随之发生变化，当然也有的思想家其思想是不断进步完善的，在政治活动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现代入学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等都发生了很大的思想变化，后来梁漱溟、冯友兰等人的思想在建国后也发生了变化。

第二，吸收借鉴外来思想，努力构建新的思想体系。各个思想家都从不同角度汲取外来的思想学说，试图构建自己的人学体系。

中国现代社会是各种思想交汇的时期，其中最显著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从李大钊、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他们努力使之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另外也有许多思想家借鉴外来思想，努力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如胡适直接应用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梁漱溟受到了法国柏格森哲学的影响，冯友兰则是将西方的实在论与程朱学说结合起来。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融会中西、贯通古今。

第三，学派众多，发展趋势各异。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入学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入学就是在这个进程中，在中西古今哲学的冲突、融合中形成的，因而流派众多，学说纷繁。

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观点来诠释人的问题，在许多问题上矛盾百出；以冯友兰、梁漱溟为代表的思想家，则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运用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料来阐述“人之理”，但并没有真正解决所提出的问题；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在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研究入学问题，表现出继续发展的良好势头。所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深入发展，各种资产阶级入学思想逐渐破产，马克思主义入学思想得以逐步发展、完善，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第一节 蔡元培论人

蔡元培(1868~1940),号子民,字鹤卿,后改字仲申,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

蔡元培少时习旧学,23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后授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认定清廷政治改良无望,毅然弃官离京南归,开始投身教育。1902年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主持革命的“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1904年组织光复会,被推举为会长,次年秋加入同盟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游学德国,攻读哲学、心理学、美学等,深受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说的影响。中华民国成立后,担任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提出新的教育方针,反对忠君、尊孔、读经,确立了一系列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原则,对改革封建旧教育、建立和发展资产阶级新式教育做出了贡献。不久,因不满袁世凯专制,再赴西欧游学和考察。

1916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采取思想自由原则,实行兼容并包主义,提倡科学民主,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与方法,整顿校风,改革教学,网罗人才,因暗中支持五四运动,一度被迫辞职。此后,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大学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与宋庆龄、杨杏佛等知名人士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7年冬上海沦陷后移居香港。1940年病逝于香港,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毛泽东主席特致唁电,称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思想影响深远,这一思

想成为五四运动解放思潮的主流。在他的思想中,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空想社会主义,都占有一定地位。他的教育思想和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主张与措施,对于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革新,起了推动作用。他在入学思想上提出的“合群利群”、“舍己为群”、“为群伦不为小己”的人生观,工作是人生天责的人生目的论等,在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著后人辑为《蔡元培全集》。

一、公民道德之要旨

蔡元培明确主张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公民道德的要旨和大纲。他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揭示者,曰自由、平等、亲爱”^①,“三者诚一切道德之根源,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②。

蔡元培力图用中国传统观念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学说加以论证。他认为,孟子所说的“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义”^③,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平等之谓也。古者盖谓之恕”^④,同样孔子思想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亲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仁”^⑤。这样,西方的思想同中国传统思想实质一样,并行不悖,西方的伦理观念是完全适合中国的。

蔡元培又进一步指出,在这三者中,自由和平等这两个观念,“二者相对而实相成,要皆由消极一方面言之”,因此必须以“进之以积极之道德”,也就是要以“亲爱”的精神来补足。这是因为人们会“因生禀之不齐,境遇之所迫”,而导致“企自由而不得,求欲人平

① 《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1页。

② 同上书,第132页。

③ 同上书,第131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132页。

等而不能”^①，所以真正的自由与平等是难以实现的。因此亲爱的精神是其中最重要的。进而，蔡元培提倡进行世界观教育，“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始终之世界观以为鹄”^②，达到提升公民道德的目的。

蔡元培非常关注人的道德思想的培养，他认为人的道德并非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涵养而成的，“是故德者，非必为人生固有之品性，大率以实行本务之功，涵养而成者”^③。而道德的形成，又依赖于智、情、意三种因素，这是因为“人之成德也，必先有识别善恶之力，是智之作用”，识别之后若“无所好恶于其间，则必无实行之期，是情之作用，又不可少也”，最后因为“既识别其为善而笃好”之后，如果“犹豫畏葸，不敢决行，则德又无自而成，则意之作用，又大有造于德者也”^④。

蔡元培认为人们修养道德要依靠个人的自省，把每个人的历史、现实与未来都与理想相对比，“勉其所短，节其所长，以求达于中和之境”^⑤。蔡元培把道德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消极道德是“无论何人，不可不守”，而积极道德“既涵养其品性，则又不可不发展其人格也”^⑥。积极道德和消极道德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翅，共同促进人的道德成长，“人格之发展，必有种子，此种子非有消极道德之涵养，不能长成，而非经积极道德之扩张，则不能蕃盛。故修德者，当自消极之道德始，而又必以积极之道德济之”^⑦。

① 《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31页。

② 同上书，第132页。

③ 同上书，第252~253页。

④ 同上书，第253页。

⑤ 同上书，第254页。

⑥ 同上书，第255页。

⑦ 同上。

蔡元培人生观的内容肯定了“舍己为群”^①的思想。他说：“教育而至于公民道德，宜若可为最终之鹄的矣。曰，未也。公民道德之教育，犹未能超轶于政治也。世所谓最良政治者，不外乎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鹄的。最大多数者，积最少数之一人而成者也。一人之幸福，丰衣足食也，无灾无害也，不外现世之幸福。积一人幸福而为最大多数，其鹄的犹是。”^②

二、权利轻而义务重

蔡元培从“利群”的观点出发，对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论述。他说：“权利者，为所有权自卫权等，凡有利于己者，皆属之。义务者，则凡尽吾力而有益于社会者，皆属之。”^③又说：“惟人之生存，既为义务，则何以又有权利？曰，盖义务者在有身，而所以保持此身，使有以尽义务者，曰权利。如汽车然，非有燃料，则不能作工。权利者，人身之燃料也。”^④

依据这个观点，蔡元培明确反对杨朱“为我，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的为我主义，同时也反对尼采“惟我独尊，而以利他主义为奴隶之道德”的观点，认为杨朱和尼采的观点“皆偏重权利之说”，他主张“轻权利”而“重义务”。在他看来，以意识之程度来衡量，生物和人类进化史表明，先有权利意识，而后才产生义务意识，即“公尔忘私，国而忘家的意识，是权利之意识，较为幼稚；而义务之意识，较为高尚”。以范围之广狭来衡量，“无论何种权利，享受者以一身为限”；“至于义务，则如振兴实业，推行教育之类，享其利益者，其人数可以无限。是权利之范围狭，而义务之范围广也。”^⑤以时效之久暂来衡量，“无论何种权利，享受者以一生为限”，“至于义务，如

① 《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84页。

② 《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32页。

③ 《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63页。

④ 同上书，第364、363、364页。

⑤ 同上。

禹之治水，雷绥佛之凿苏彝士河，汽机、电机之发明，文学家美术家之著作，则其人虽死而效力常存。是权利之时效短，而义务之时效长也。”^①

当然，他并不否定权利的必要性。他认为，人们应当享有一定的权利，享有权利是人们能够尽义务的前提。“人类以在此世界有当尽之义务，不得不生存其身体。又以此义务者非数十年之寿命所能竣，而不得不谋其种姓之生存。以图其身体若种姓之生存，而不能不有所资以营养，于是有吸收之权利。又或吾人所以尽义务之身体若种姓，及夫所资以生存之具，无端受外界之侵害，将坐是而失其所以尽义务之自由，于是有抵抗之权利。此正负两式之权利，由义务而演出者也”。^② 由此他强调“义务为主”，“权利为从”，“权利轻而义务重，且人类实为义务而生存。”

三、工是人生之天责

蔡元培一反历来统治阶级轻视劳动，鄙视劳动阶级的观念，提出“工是人生之天责”的人生目的论。他说：“人不能有生而无死。现实之幸福，临死而消灭。人而仅仅以临死消灭之幸福为鹄的，则所谓人生者有何等价值乎？”又说：“西人有句格言：‘人不是为食而生活，是为生而食的。’我仿他的语调造一句：‘人不是为生而工，是为工而生的。’有一种做工的人自己说是‘谋生’，仿佛是为生而工的凭据。但这是经济界病的现状，决非全部的人生观。”^③ 他列举人类对于科学、技术、哲学和美术的发展说明，科学家为了新发明，往往牺牲生命；文学家美术家的著作，往往不被同时代人理解，遭到揶揄非笑；哲学家的新主义，也往往受旧社会的反对。但是，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冒险做工”，乃是“出于自然的冲动，决非是为生活的欲

① 《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64、363页。

② 《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291页。

③ 《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78页。

望强迫而成的”，他们“知道工是人生的天责”。他明确指出，“我们要认识劳工的价值。”“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劳工神圣！”^① 这种尊重劳工，把劳动、工作、创造作为人生目的的思想，是极为宝贵的。

第二节 陈独秀的人学思想

陈独秀(1880~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属安庆)人，中国现代思想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因故乡有独秀山，故改名独秀。

1896年应科举考试，中秀才。次年入浙江求是书院攻读法文和造船专业，因发表反清文章被通缉，避居安庆，后赴日本留学。1902年为反对《中俄密约》回国，在安徽进行宣传活动，1912年任安徽军政府秘书长。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

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猛烈抨击袁世凯复辟帝制掀起的尊孔复古思潮，倡导新文化运动。1917年初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次年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五四运动中被北京军阀政府通缉，离北京赴上海。

1920年9月在上海组织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历史转变，并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党的中央书记，后被选为党的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大革命后期犯有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改选中央领导机构时落选。次年拒绝出席中共六大。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2月与彭述之等在上海成立托派组织。1931年5月又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任总

^① 《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19页。